



红墙里的领袖们

本书以“还原历史真实面目，讲述伟人传奇人生”为宗旨，以翔实可靠的资料，认真客观的编写，严谨科学的体例，为您全面、真实地记录伟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呈现更为清晰的中国伟人形象。

于俊道◎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墙里的领袖们



主编 于俊道 编委 文川 邵洋 肖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南海里的肝胆相照 / 于俊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161-2143-6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9705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 云
特约编辑 高 蕙
责任校对 赵海朋
责任印刷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72千字
定 价 44.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毛泽东答黄炎培的诤诤净言	尚 丁	1
毛泽东与何香凝：“杰出的女性”	贾思楠	12
毛泽东与谢觉哉：“保存精力，长期奋斗”	王定国	14
毛泽东与郭沫若：挚友、诗友	吴正裕	18
毛泽东与李达：“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	宋镜明	20
毛泽东：“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	许瑞凤	23
毛泽东给齐白石送寿礼	晓 轮	26
毛泽东为爱国侨胞陈嘉庚题词	庄明理	28
毛泽东与周谷城：“18 年了”	周谷城	31
毛泽东与柳亚子：诗坛佳话	夏 鹭	34
毛泽东与李淑一：双重情谊	钟 辰	38
毛泽东与梁漱溟：窑洞里的坦诚交谈	梁漱溟	40
毛泽东与章乃器：党与非党友谊往来的老朋友	林涤非	43
毛泽东与李宗仁：“你是误上贼船了”	程思远	45

毛泽东与傅作义：“你看，这一块补得好不好？”	夏 鹭	47
董其武：“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董其武	51
毛泽东与张治中：“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	余湛邦	55
毛泽东与卫立煌：“盼早日来京”	赵荣声	61
毛泽东与载涛：“知我者毛泽东也”	王乃文 辛芳	68
毛泽东与溥仪：“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	水 边	69
毛泽东与萧三：“特来专诚拜谒”	萧 三	71
毛泽东颐和园访丁玲	甘 露	77
毛泽东与萧军：“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	王德芬	82
毛泽东与吴启瑞：“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谈福兴	92
毛泽东与斯大林：伟大的历史性会晤	[苏]费德林	97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在中共领导人中是出类拔萃的”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04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人类中的一个伟人”	[柬埔寨]西哈努克	106
周恩来与李四光：生死知音	… 摘自郑毅涛主编的《广交朋友的周恩来》	110
周恩来与马寅初：“周总理无私”	郑毅涛	120
周恩来与张治中：“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郑毅涛	127

周恩来三哭张学良	程兆盛	134
周恩来与齐白石的忘年交	… 摘自郑毅涛主编的《广交朋友的周恩来》	136
周恩来：“徐悲鸿的死，是一个永远无法补偿的巨大损失”	李 静	144
周恩来与梅兰芳：“我们是同行”	纪 舟	148
周恩来与盖叫天：“您让我露脸了”	沈祖安	152
周恩来与程砚秋：“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郑毅涛	161
周恩来与老舍：“总理又给我出题了”	胡絮青	165
周恩来与袁雪芬：“年轻人，我们交个朋友吧！”	杨 光	175
周恩来与赵丹：“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易飞先	179
周恩来与新凤霞：“你们要注意她的安全”	新凤霞	181
刘少奇与王一知：亲切的教导，热情的关怀	王一知	187
朱德与金汉鼎：身分国共，情比地天	肖 遥	189
朱德与卫立煌：真诚的合作	赵荣声	190
朱德与阎锡山：副司令长官与司令长官的一次会见	李 刚	197
朱德与王葆真：“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	王若林 朱菊娥 王振林	199
朱德与李师弼：“共产党人是不讲私人关系的”	李师弼	205



朱德与傅德辉：一张借据的际遇	华 伐	207
邓小平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	艾 多	209
邓小平与荣毅仁：“荣老板嘛！”	计泓赓	212
邓小平与乔冠华：“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	章含之	219
邓小平与聂卫平：“伟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闻 边	220
陈云与马寅初：崇高的友情	杨建业	223
陈云与章乃器：同志和诤友	章翼军	229
陈云与侯宝林：“你是全国有名的教授了”	力 砚	233
周恩来与胡志明：“他是我的老大哥”	何延虹	234
周恩来与西哈努克：跨越国界的友谊	刘爱成	239
周恩来与斯诺：“像周总理这样的人真了不起”	陈扬勇	248
周恩来与冈崎嘉平太：“周总理是我的人生之师”		265
周恩来与松崎君代：“对你，中国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梅 子	266
周恩来与卓别林：“我是您的忠实观众”	向 黎	270
刘少奇与斯大林：“学生应该超过先生”	伊 凌	273
刘少奇与胡志明：“心心早相印，今日喜相逢”	伊 凌	276

刘少奇与赛扬：“伟大，中国共产党！”	金 凤	278
朱德与史沫特莱：友谊逐日深	建 平	279
朱德与斯特朗：“他简朴得像个农民”	魏 华	286
朱德与史迪威：“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	姚建平	289
邓小平与金日成：金子般珍贵的友谊	关晓丽	291
邓小平与华莱士：“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关晓丽	296
邓小平与奥林埃娜·法拉奇：“我一生问心无愧”	郑晓国 南东风	302
邓小平与陈树柏：“我就称你陈教授吧”	郑晓国	308
邓小平与爱泼斯坦：“您做的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日 农	311
邓小平与李政道：“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刘金田	314
邓小平与科拉松·阿基诺：“我不能对你说不能抽”	科拉松·阿基诺	319
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	郑晓国	321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瞩目世界的会晤	关晓丽	323
邓小平与希思：“你建议我下次到哪里去看看呢？”	刘金田	328
邓小平与卡特：“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关晓丽	333
陈云与阿尔希波夫：“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刘书楷	341

毛泽东答黄炎培的诤诤诤言

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 20 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黄炎培这样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却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那么自由、温暖和光明，共产党的领袖和鼎鼎大名的将领又那么温文尔雅。这要多大的勇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黄炎培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为了解除民族工商业者的疑虑，在对上海工商界的一次讲话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比喻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

1945 年 7 月 1 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 6 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飞机于上午 9 时 35 分起飞，下午 1 时半平安到达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到机场欢迎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 30 来人，一一握手致意。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 20 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 年 5 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 100 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盛赞毛主席好记性。黄炎培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和黄炎培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样样都很新鲜。晚上他在雪一样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胧中吟成七律一首：

延 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这是一首感时记事的诗，诗人借宋代范仲淹的故事，抒发了初到延安的感受。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6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靠山面阳。他们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毛泽东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似乎就是大会堂的后身上层。会客室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20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画是1943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出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暖流流遍了他周身，使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在3天中和毛泽东促膝长谈达十几个小时，造成了他自认为一生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

他在延安的5天当中，会晤了许多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还对他执弟子礼。当然，他们一行访问延安，主要是为国共团结谈判问题。但在黄炎培，却是一次对他的晚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留学”。而毛泽东和黄炎培这

两位政治家和诗人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专程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谈了整顿三风的运动，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说上的看法。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诤谏净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话，至今仍是不易的至理名言。

当时，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的5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真是满载而归。7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12时50分飞离延安返回重庆。在延安短短的95个小时的访问，大大澄清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眼界，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前进了。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的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出版。



就在那个年代，国民党造了多少谣言，天天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把边区描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用来欺骗老百姓。而黄炎培这样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却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那么自由、温暖和光明，共产党的领袖和鼎鼎大名的将领又是那么温文尔雅。这要多大的勇气！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他的讲话和文章，在大后方造成多么大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了。

《延安归来》一书，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这是第一本拒绝把原稿送交国民党审查机关审查而自行出版的书，点燃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制度。

黄炎培从和毛泽东、中共中央领导人建立的深情厚谊中获得了力量。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在毛主席留渝的43天中，黄炎培和毛泽东有上10次的会晤和聚宴。这是黄炎培访问延安和毛泽东交往的续篇……

黄炎培是1949年2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的。他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两位政治家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3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了。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相见，其欢乐是无可言喻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征衣未解，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又在百忙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一旦脱离黑暗的樊笼，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黄炎培心潮澎湃。当第3天叶剑英（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和徐冰同志在国民大戏院为他开欢迎会时，他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随后，毛泽东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和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站起来，迎接上海解放。

黄炎培既不是资本家，也从不经营工商业，而是一位一生清贫的教育

家。但他毕生从事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上万的技术人才，所以，他和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对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民主建国会的全体成员，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将是他晚年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这一类文件（生动和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泽东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勉励，信说：“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的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黄炎培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他把激情即席抒发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诗共八节，热烈地歌颂了党和革命人民的丰功伟绩，并亲笔恭书呈献给毛泽东。

建国以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儿子黄大能曾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详告以周恩来总理动员他任职的经过。这一方面说明他坚定地遵从党的安排，同时，也说明他对历史使命有正确的认识。他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他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作风，

做事认真、踏实，待人和气、虚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书，积下一些理想，所认识的道理，就是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好好做呢？”

黄炎培是一位富有强烈献身精神的爱国者。当他一旦寻找到了真理，他就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他自觉地接受毛泽东和政府交付给他的历史使命，尽忠职守，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他是以自身的进步，去推动一个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前进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所以，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党的帮助之下，经过自我搏斗，在自我批判中前进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经常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向党向毛泽东和盘托出。他的正确意见，是对党的诚挚净言；不正确的观点，也能及时地得到党和毛泽东的帮助，经过认真的自我剖析，扎扎实实地前进一步。

如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动触动到了他们，不免怀着极大的恐惧和疑虑。一时间，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也收到不少此类的告状信件，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对黄炎培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诚恳地以各种方式用事实启发他的觉悟，帮助他前进。毛泽东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泽东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关照他们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区情况和他详谈。”临行前，毛泽东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毛泽东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切和帮助，黄炎培是衷心感激的。他经半个月的实地考察，心里明亮了，他立刻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地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新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回到北京，他立刻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首先肯

定“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他也坦率而恳切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最后，他还就考察所及，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黄炎培的意见，并非完全正确，但他能坦率忠诚地对党提出谏诤净言，是十分可贵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也是十分重视的。不久，党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在镇反工作中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纠正了新出现的“左”的偏向。

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三反”运动，随后又展开了“五反”斗争。黄炎培敏感地意识到这将对民族工商业者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他立刻和民建会的领导人一起认真学习并组织动员工商界中的民建会员，带头参加运动，清除自己身上的“五毒”行为，这个运动对工商界起到了去腐生新的作用，为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毛泽东阅信后，特地邀约黄炎培晤谈。黄炎培在当天（3月15日）的日记上写道：“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对于毛泽东的谈话，黄炎培很信服地接受，并不折不扣地在民建会内部层层作了传达。并在当年7月，召开了民建会总会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加以贯彻执行。这是民建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明确了民建会的性质、方针和今后任务，制定了民主建国会新的章程，调整了领导机构，黄



炎培被选为民建总会的主任委员。

建国以来，黄炎培和民建会同志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了历次运动，并主动地宣传党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开展爱国守法和自我改造教育。1952年9月初，民建会北京市分会将举行会员大会，黄炎培将出席讲话，他先认真地亲自写出了讲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他特地把讲稿先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立刻帮他仔细地修改了讲稿，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唯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毛泽东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一、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家经济的领导”；二、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挥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之所以作这样的修改，还在信中诚恳地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的‘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

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那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帮助是赤诚的、同志式的。从现在来看，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黄炎培反复读了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思想豁然开朗，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明白地呈现在眼前了。

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黄炎培读了极其感佩振奋，一方面他反复阅读和思索，使他感到沐浴在社会主义的曙光之中；同时，当晚他就给毛泽东写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

1952年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建会北京市分会在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立刻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普遍的良好反响。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毛泽东的指示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就这样，毛泽东的指示和黄炎培的报告，给“三反”、“五反”以后的工商界带来了信心和新的生机，也给民族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此后，黄炎培在党中央领导人指导之下积极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还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1953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黄炎培意识到这是党和人民交付给他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使命是非常光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资产阶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例呢，这是党和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黄炎培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为了解除民族工商业者的疑虑，在对上海工商界的一次讲话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比